

# 谋求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平衡发展

吴 心 伯

**【内容提要】** 冷战终结后,中日美三边关系正在进行重新定位。美日同盟的强化使三边关系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将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使中日美三边关系步入稳定、平衡和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 中日美三边关系 平衡 良性互动

**【作者简介】** 吴心伯,1966年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 邮编:200433)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日美三边关系便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演变。后冷战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日、美三国力量对比的消长使中美、中日和美日三对双边关系都在摸索重新定位,三边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地作用于其他两对双边关系,并使三边关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日美三边关系存在着哪些互动模式?冷战终结后三边关系的特点是什么?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将对中日关系和中日美三边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 中日美三边关系的互动模式

本世纪以来,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是从30年代后期到二次大战结束,中美两国携手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第二种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访华,美日两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联手遏制中国。第三种是从尼克松访华到80年代末,在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基础上,中日美三边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消失,中日、中美和美日关系良性互动,平衡发展。第四种是90年代初,由于冷战结束,美国对中国采取孤立和高压的政策,中美关系趋向紧张;日本则采取有别于美国的立场,对华政策比较温和,中日关系好于中美关系。

分析中日美三边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影响三边关系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因素:现实的国家利益和抽象的意识形态。

回顾二战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历史轨迹,可以得出三点启示。首先,当国家利益考虑成为支配中日美三边关系或其中一对或几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时,三边或双边关系就会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从而不仅促进中、美、日三国的利益,亦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之,如果意识形态因素在多边或双边关系中突出,这些关系就会遭到挫折,并对地区局势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在冷战期间,中日关系受制于中美关系。二战以后,日本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日本在制订对华政策时不得不惟华盛顿马首是瞻。对东京来说,日中关系必须服从于日美关系。当华府决策者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孤立和遏制新中国时,曾经在近代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也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同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外交关系。中美两国在50~60年代的对抗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但是当尼克松总统以战略家的远见和气魄决定打开对华关系时,日本在遭受“尼克松冲击”之余,急起直追,迅速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美关系的解冻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三,在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度出现

了独立于中美关系的态势。冷战终结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减少了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依赖,谋求成为超级大国的愿望也促使东京在制订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当美国对天安门事件作出激烈反应而使中美关系严重受挫时,日本作出的反应则比较谨慎、低调。东京还顶住压力,率先解除对华制裁,中日关系最早走出“六·四”事件的阴影。日本不支持克林顿政府把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也是促使克林顿政府最终在这个问题上改弦易辙的原因之一。这表明,当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会对中美关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中日美三边关系的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中日美三边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三边关系中,每一方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其他两方关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华盛顿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选择同北京和东京关系的状态:或亲中疏日,或亲日疏中,或同时与中日两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美国处理同中、日关系的下限是它不能同时疏远这两个东亚大国,否则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就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对中国和日本来说,它们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日本在政治上分别具有脆弱的一面,因此两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防御性和被动性。”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内议程决定了它必须与当今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日两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但中国希望鱼与熊掌兼得。日本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日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如此。但是另一方面,东京越来越感受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中关系的经济和战略意义都在上升。如果对美关系处理不好,日本外交就会失去一根重要支柱;如果对华关系不睦,则日本外交的活动空间就会变窄。因此对日本来说,比较理想的是同中、美均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尽管对美关系仍优先于对华关系),避免同任何一方的关系过于疏远。

其次,从亚太地区层面看,中美、美日和中日这三

对双边关系的分量参差不齐。就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战略的综合性而言,中美关系处在第一层次。在人口、幅员、军事能力和地缘战略地位方面,中美是亚太地区最有分量的两个大国。中美合作是地区安全最有力的保障,在促进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稳定方面,中美两国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中国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力还不如日本,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和它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示了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前景。有鉴于此,华盛顿希望把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作为中美战略对话的一部分,使中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成为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可以从反面来观察。如果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和对立,其影响将是全局性的:东亚将出现分裂,许多国家将在政治上面临着困难的选择,整个亚太局势将会变得动荡不安。

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处在第二层次。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个经济强国,美、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亚太和全球的经济格局。从战略上看,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位居各国之首的力量输送能力,日美同盟又使美军在东亚拥有军事基地和前沿部署,美日关系对地区安全形势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所处地理位置的局限和二战政治遗产对日本的制约,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政治与战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一事实削弱了美日纽带对亚洲大陆的影响力。换言之,由于日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跛足”,美日关系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被局限在亚太的海洋部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美日同盟瓦解,日本奉行独立的防务政策,大力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将会引起东亚国家的警惕与不安,并有可能导致地区军备竞赛的发生。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位居第三,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目前都只是地区性大国和一般性强国,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或超级大国,因此,这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东亚。从地区层面看,良好的中日关系反映了日本同其主要邻国的和解,有助于推动东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合作。但由于日本政治与经济能力的欠发达,中日关系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是有限

郭隆隆、赵念渝编著:《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的。事实上,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及其在东亚影响的强烈存在,中日关系的地区意义屈居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之后。只有当美国与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关系同时出现严重的紧张,或者美国从东亚实施战略收缩时,中日关系的地区影响才会大大上升。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两种情形都不大可能发生。

第三,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都在摸索重新定位,在此过程中,三对双边关系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波折。美日关系曾一度面临着“经济第一”还是“安全第一”的选择。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为了解决居高不下的对日贸易逆差,把经济问题摆在美日关系的首位,美日贸易摩擦一度十分激烈,美日关系趋于紧张。由于日本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加之华盛顿意识到必须继续把安全作为美日关系的基础,并对美日同盟重新定义,美日关系才恢复了稳定。中日关系在1994年以后围绕着台湾问题、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中国的核试验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问题等出现了摩擦。这些看似层出不穷的纠纷揭示了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以及中国该怎样因应一个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中美关系自1989年以来因人权问题、经贸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而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紧张。困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重要性,如何重新确定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框架,以及如何行之有效地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克林顿政府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方向性调整。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强调要在两国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处理日益密切同时也更趋复杂的两国关系确立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第四,中日美三边关系发展不平衡。客观上,三边关系的结构存在着不平衡,这主要是指中、日、美三国在三边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时每一对双边关系的分量也各有轩轻。这种结构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国家实力的差异引起的,很难在短期内人为地加以改变。三边关系发展的不平衡则主要是指中美、美日和中日三对双边关系在发展态势上出现不一致、不协调的局面,某一对双边关系与其他两对双边关系产生矛盾和抵触,从而影响了三边关系的平衡与稳定。这种

发展的不平衡既可能是由结构的不平衡引起的,但也有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

目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美日关系同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不协调。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东京和华盛顿强化了双边安全同盟。重新定义后的美日同盟把着重点从冷战时代保卫日本列岛的安全转移到维护地区稳定上,用意之一是要提防和牵制力量不断上升的中国。这样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便形成美日联手对华的格局。如前所论,在三边关系中,本来中美关系的分量最重,但出于牵制和提防中国的需要,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它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被人为地提升,其结果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受到冲击,三边关系的发展严重不平衡。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不是因为三边关系结构的不平衡造成的,而是由于美日两国的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失误。如同美日两国在50年代把新中国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一样,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和东京认为中国的崛起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机会。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政策的失误,政策的失误造成了三边关系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状况不仅损害了中、日、美三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会对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

## 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决心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对中日美三边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推动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当前三边关系的态势是美日关系过分强化,中美关系的改善刚刚起步,而中日关系相对滞后。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江泽民主席访美和克林顿总统访华后两国关系所出现的积极的发展势头,无疑使东京感到日本的对华政策慢了一拍。日本决策者当然明白,美国和欧盟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背后,是要抢占中国的大市场。从1998年起的三年内,中国将对基础设施投资一万亿美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对欧美各国无疑是一块十分诱人的馅饼。日本对华政策的落后,多少意味着它在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精明的日本政治家不会看不清楚。出于现实

的利益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自然要被赋予更大的迫切性。日本《朝日新闻》在评论克林顿的中国之行时强调:“必须在维持日美良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另一方面,东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似乎怀有某种不安全感。当年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关系,是以所谓“越顶外交”的形式绕开日本完成的。尽管日本是冷战时代美国遏制中国的桥头堡,但中美关系解冻的秘密外交,佐藤政府完全被蒙在鼓里。这次华盛顿表示要同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东京虽事先不至于一无所知,但为了防止出现中美关系升温太快而将日本“晾”在一边的局面,日本必须通过改善对华关系而积极地介入其中。正如《朝日新闻》的社论所指出的:“必须加紧构筑新的日中关系,使之适应美中合作的新时代。”事实上,如果日中关系与中美关系平行发展,日本可以争取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更多地与其协调,提高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

其次,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创造一个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环境。对中国来说,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日本谋求通过美日安全同盟来从战略上牵制中国,二是日本军事能力的增强和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前景,三是台湾问题。华盛顿表示要以接触而不是遏制的手段同中国打交道,视中国为战略伙伴而不是战略对手,这有助于减轻中国对美日安全同盟的疑虑,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对日本联美制华意图的警惕心理。中美要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就东亚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对话的议题应包括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限度以及日本在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如果中美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将会大大降低中国对日本加强军事能力的担心。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日本有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日本基本上是跟美国走:如果华盛顿对台政策放松,则东京也会乘机跟进,反之亦然。在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克林顿政府承诺了对台政策的“三不”方针,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在美国对台政策趋紧的大背景下,日本势必也会在日台关系上谨慎从事,避免使台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新的“摩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正面效应。

第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会使中日美三边关系出现良性互动的局面。所谓良性互动,这里是指一对双边

关系的发展会促进而不是妨碍其他两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美日强化安全同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含有牵制第三国(如中国)的意图,前者则无针对第三方(如日本)的动机。因此,当美日军事同盟被重新定义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对中美和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中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则不会妨碍中日、美日关系的发展,相反,它有助于抑制美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即针对中国的方面),并带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事实上,在中美关系渐入正轨的大背景下,北京已经把改善中日关系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秋天江泽民主席对日本的访问,势必会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如果届时两国领导人就中日关系的发展框架达成共识,则面向21世纪的中日美三边关系的调整就会初现雏形:这就是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日保持同盟关系,中日发展睦邻伙伴关系。不言而喻,这种调整将促使中日美三边关系平衡、健康和稳定发展。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某种消极影响?理论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美日关系的状况,以及日本的政治与经济能力。如果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美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加强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合作,并在21世纪初形成比较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则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两国贸易战烽火不断,双边关系龃龉频生,同时日本经济振兴乏力,无法再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政治上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又难以实现,那么,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都会下降,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均会大打折扣,中日美三边关系将出现中美关系“一枝独秀”的局面。

实际上,出现上述情形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制约因素。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两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也大相径庭。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美国将继续保持一定的戒备心理,对华结合使用接触与牵制的两手,中美关系的动荡起伏在所难免。其次,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重要性

[日]《朝日新闻》1998年6月28日。

# 世纪末欧元展望

甘当善 王应贵 夏业良

**【内容提要】** 由于成员国精心准备,政治决心大,确保欧元的稳定和信誉,欧元发行后,在短期内将趋稳定。欧元将为欧洲带来一个极富活力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规则和惯例将趋于统一,使欧洲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更加有效,更具竞争力。同时加快欧洲银行的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巨大的欧元市场也为亚洲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为亚洲的出口创汇带来更大的市场。

**【关键词】** 欧元 欧洲资本市场

**【作者简介】** 甘当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应贵、夏业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上海 邮编:200437)

欧元的诞生是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启动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体系都是一次历史性变革,对亚洲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 欧元的内在价值及其走势分析

正逢世界经济变化迭起、金融危机余波未尽之际,欧元前景如何?根据我们对欧元区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的了解和观察,在世界经济局势渐趋紧张的背景下,我们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欧元是一种强

势货币,其汇率的基本态势稳定,虽然短期内略有升值压力,但前景依然乐观。

近两年来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各成员国在经济绩效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良好的宏观基本面是欧洲统一货币稳定的坚实基础。首先,参加埃居(欧洲货币单位)一篮子货币的汇率走势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为欧洲货币联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利时和卢森堡法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法国法郎、爱尔兰镑、荷兰盾、奥地利先令和葡萄牙埃斯库多,加入汇率机制已有两年零十个月了,至今尚未承受重压。

在这些货币中,只有爱尔兰镑波动幅度经常超过

可能会相对下降,但美日关系毕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关系,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它们之间的分歧明显少于中美之间的分歧。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仍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利用的一笔重要资源,在华盛顿的战略棋盘上,良好的美日关系乃是美国实现其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目标的关键一着。第三,对中国来说,虽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中日关系之上,但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则超过中美关系。在中国推动“多极化”和谋求建立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努力中,中日关系构成重要的一环。无论中美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中日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和两国“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决定了

对日关系仍将在中国的外交天平上显示重要分量。

由此看来,较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增强,双边关系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中的分量上升;在此背景下,美日关系的分量相对下降,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有所淡化;中日关系将在综合考虑历史与未来、政治与经济、美日关系与美中关系等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本着务实和互利的原则,两国关系可望得到改善和发展,其重要性将有所提高。三边关系在整体上呈现稳定、平衡和良性互动的发展势头。

[责任编辑 邵峰]